

百家文库

记录古往今来世间百态
彰显中华大地万象更新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 编辑历程

Chinese Modern Writers' Editing Progress

蒋成德
著

百家文库



作家与编辑，这是一个交叉的学科

本书选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代表性的14位作家，章炳麟、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郭沫若等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 编辑历程

Chinese Modern Writers' Editing Progress

蒋成德 著

百家文库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编辑历程/蒋成德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8. 11

ISBN 978-7-5068-7147-1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编辑工作—研究—中国—近现代 IV. ①G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5215 号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编辑历程

蒋成德 著

责任编辑 刘 娜 甄云霞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40 (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3 千字

印 张 22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7147-1

定 价 95.00 元

序

成德先生是一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杂志的编审,又是从事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最近,他应出版社的要求,欲出一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编辑历程》的书。本来是请深圳大学王晓华教授给写序,但晓华教授拿到书稿,翻阅过后给我来电话,说能不能请我代劳,其理由是该书内容全是有关现代文学方面的作家的编辑历程的,而我正是教学与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我与晓华是南京大学时期中文系的同窗好友,情谊甚笃,其时常在一起侃山海经,当然也做点正事,跟几位同学一起做文化对话。看在同窗份上我只能为其代劳。成德先生与我在深圳等地学术会议上曾有过两次晤面,我欣赏和佩服他的学术学问。成德先生来信邀我,我也就斗胆应承为他的著作说几句。

《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编辑历程》是成德先生历时多年,精心研究撰写的一部著作。全书共写到14位近现代史上的作家。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仅仅是以作家的身份出现,也不仅仅是以编辑家的身份出现,他们还是思想家,教育家,文字学家,有些还是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与早期领导人。他们是搅动中国时局、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章炳麟、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瞿秋白、夏衍、丁玲、巴金。一长串熟悉的名字,一个个伟大的人物,但在成德先生的著作中,他们又都是以编辑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编辑。成德先生这本著作

的魅力就在这里。作为读者,我们会从书中看到这些编辑,这些编辑家们有哪些超越一般编辑,与一般编辑家的地方?他们作为革命家,作为政治家,作为文学家,作为学问家,在编辑工作中又表现出哪些不同的甚至是杰出的眼界与气质?他们在作为编辑的生涯中又发生过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等等,这部著作当然会为我们解开这些谜团。

就编辑这个行当而言,在传统的纸质媒介时代主要是三种类别。一是报纸编辑,一是期刊编辑,还有就是图书编辑。一般而言,办报取向于政治,办刊取向于学术,而编辑图书丛书则是取向于文化建设。他们会在时代的某个阶段,或是人生的某个时期有着不同的选择。

政治家办报,这是我看了这部著作之后所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办报的大都是政治家,因为报纸的传播时效要比期刊与图书快得多,好得多,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也大得多。像章炳麟、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是政治家。他们办报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政治,为了革命,为了弘扬某种理想。如章炳麟(1869—1936),“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创办报刊,主张排满反清,鼓吹资产阶级革命”。他晚年致力于国学,成为国学大师,“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章炳麟“从1897年任职《时务报》,到1935年创办学术杂志《制言》,前后近40年从事报刊的编辑活动,从而构成他一生社会活动、学术活动之外的重要内容。”章炳麟从办报到办刊的改变,其实是他人生选择的改变。“辛亥革命胜利后,章炳麟认为‘排满’之志已伸,政治主张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相去渐远。‘五四’以后,章炳麟政治上更趋落后,由反对军阀割据演变为赞成军阀割据,……思想上遂‘既离民众,渐入颓唐’,‘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再如梁启超(1873—1929),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派政治活

动家。他“从1891年帮助康有为编书,到1927年晚年开始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从事编辑活动达38年之久。”在其一生中,创办主编以及支持指导的报刊就达17种之多。“像《时务报》《清议报》,前期《新民丛报》等对改良主义的思想宣传,厥功甚伟,对近代报刊编辑事业,也是贡献很大的。”在梁启超编辑生涯的四个时期中,“因其思想的进步与落后,所编辑的报刊以及色彩也不相同。大致说来,前两个时期配合戊戌变法运动,积极宣传改良主义的思想主张,所编辑的报刊以及他的编辑思想是进步的;从第三阶段后期开始,他的思想趋于保皇立宪,与革命派的《民报》论战,与马克思主义的《新青年》论战,则所编辑的报刊以及他的编辑思想是落后的了。”梁启超晚年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也说明其政治家的热情已经消退,而去从事学术与文化建设的事业了。

再有如陈独秀(1879—1942),“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非常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人物。无论是中共党史,中国政党史,近代政治思想史,还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教育史、戏曲史、文字学史等诸多领域都要涉及他。”他主编《新青年》影响之广大、之深远,是空前的。毛泽东曾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当然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他还与胡适之一起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思想与艺术的基础。陈独秀办报并非仅仅是以编辑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他看到了社会‘百政俱废’,人民‘生机断绝’,所以欲借助编辑报刊来革新社会,革新思想。”陈独秀曾说过:“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正如他所办《国民日报》的“发刊词”所说:“将图国民之事

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因为“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他是这样的看重报纸的舆论作用。他坚持办报的目的就是要“唤醒群众,起而救亡”,办报就要坚持其宗旨,如若不能坚持,则“宁可停办,不图改良”。成德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是如此这般准确地传递了政治家办报的事实与理念。

思想家学问家办刊,这是我阅读本书的第二个印象。像鲁迅(1881—1936)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伟大的编辑家,“他那崇高的编辑目的、编辑牺牲精神和为中国近现代编辑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奠定了他在编辑出版史上光辉的地位。”鲁迅在其还未从事文学创作之前,就已经投身于编辑活动,他抱着伟大的编辑目的:即“转移性情,改造社会”,“改变精神”来从事编辑这项工作,“这一神圣而庄严的目的——一直贯穿他30年编辑活动的始终,成为他自觉的人生追求”。在这一编辑目的指导下,他一生编辑了数十种文学期刊、书籍和丛书,还对现代木刻版画作品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编辑出版。“鲁迅在从事编辑的同时,还不时地对编辑出版界的恶劣现象予以批判,以对现代革命编辑活动正确的引导。”“鲁迅的一生除了创作、翻译外,就是编辑出版工作,这构成他整个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德先生的这部著作对于鲁迅的编辑活动,编辑思想,以及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所做出的贡献着力颇多,在全书中所占篇幅也最丰,体现了本部著作对于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编辑事业中贡献的尊重与推崇。

当然,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文学家,在他们一生中的编辑生涯方面,总不会一成不变。他们会随着时代与人生路径的变化来选择与接受具体编辑的对象、形式与内涵,但他们断断不会违背自己的其时意志与人生宗旨。像李大钊、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闻一多、瞿秋白、夏衍、丁玲、巴金等人的编辑历程无不显示了这样的特征,这是我阅读本书所得到的第三个印象。

此外,在我看来成德先生的这部《中国近现代作家的编辑历程》著作,不仅在中国近现代编辑史上已占先声,而且也绝不会仅仅是一部有关中国近现代作家编辑历史方面的书,她还会是一部有关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书。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是为序。

范钦林

2018年10月24日

论编辑

——“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代前言）

巴金在《十月》杂志创刊三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致〈十月〉》的文章，着重谈的是“关于编辑的一些事情”，其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巴金的编辑意识。他说：“做编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从编辑的观点看问题”，这里的“编辑的观点”应该是包括编辑工作的全过程和编辑事务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很重要的是对编辑主体的认识。巴金认为：“编辑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以“桥梁”来比喻，十分形象地揭示了编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是巴金最重要的一个编辑意识。

一、编辑的作者意识

巴金说：“我一直被认为是作家，但我也搞过较长时期的编辑工作，自以为两方面的甘苦都懂得一点。”^①正是身兼编辑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两者他才有很深入的体验，也才有很深刻的认识。从作家的角度来说，作家的创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创作的成果乃是心血的结晶。作为编辑应该理解作家创作的不易而珍视作家的劳动及其产

① 巴金：《致〈十月〉》，《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74页。（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文。）

品。因此,编辑就要在头脑中树立起明确的作者意识,离开了作者,编辑就会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难境地而一事无成。有长期编辑经验的巴金对此有很深刻的认识,他说“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①,真是一语道破了编辑的作者观。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在于他能够“发现新的作家”。这是因为,“新作者的‘处女作’常常超过成名作家的一般的作品”^②。作为编辑就要有那种独具的眼光和胆识,“众里寻他”,把他“发现”出来。新作者之所以有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新”,在于他有超常规、超常态乃至超常度的表现,或是逆反而表现出“新”,或是破旧而表现出“新”,或是创造而表现出“新”,这种“新”往往不易被人接受,但很有可能是很有生命力的。编辑就要能够“发现”这种“新”,以编辑的眼光看到他的发展前途而大胆地予以发表。这是编辑应有的责任,也是编辑应该具备的识力。巴金对此有特别深的体会,他就是被叶圣陶“发现”,而走上文坛的。巴金说过,如果不是叶圣陶“发现”了他,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灭亡》,那么,他也许就不会从事文学创作,以创作为职业,而走上另一条道路。可见,叶圣陶的“发现”,对巴金的人生道路影响之大,巴金正是以叶圣陶“发现”自己为显例而去“发现”他人的。在现代文学史上,被巴金发现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新作家是不乏其例的。为编辑界、文学界传为佳话的是巴金对戏剧家曹禺的发现。1934年,巴金在编辑《文学季刊》时,在靳以那里看到已存放了两三年的曹禺的剧本《雷雨》,他一口气读完,不仅“被它深深感动”,“而且为它掉了泪”。一种“发现”的快感激动着巴金,他说:“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

① 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② 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①于是巴金决定在《文学季刊》第1卷第3期发表《雷雨》。就这样,一代著名的剧作家曹禺由巴金的“发现”而走上文坛,为中国现代戏剧掀开新的一页。此时,巴金也只有30岁,曹禺只有25岁,巴金不只“发现”了曹禺,发表了他的《雷雨》,以后还把这部作品和《日出》《原野》,分别收进由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集、第3集和第5集。《曹禺戏剧集》也是由巴金编辑的、交由他担任总编辑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见一个作家的成功,离不开编辑的劳绩,尤其是新作家,更离不开编辑的“慧眼”。不仅曹禺,像何其芳、罗淑等作家都是因为巴金的“慧眼”发现而被推上文坛的。何其芳的名诗如《罗衫》《梦歌》《秋天》《花环》《爱情》等最早即是由巴金在担任主编或编辑《水星》、《文学季刊》和《文季月刊》时发表的。女作家罗淑在当时默默无闻,正是巴金发现了她的才华,把她的《生人妻》发表在《文季月刊》上,为中国现代文坛推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至于像芦焚(《谷》)、臧克家(《运河》)、陆蠡(《海星》)、丽尼(《黄昏之献》)、刘白羽(《草原上》)、肖乾(《栗子》)、荒煤(《忧郁的歌》)等人无不是被巴金发现而出版了他们的第一本书,使他们在文坛上成了名。这种发现完全是出于一个编辑的职责,是不带任何私心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要靠新人的不断被发现而得以更新、创造和发展。巴金正是以发展民族文化事业为基点,以编辑的“慧眼”注视着文坛上的无名作家,因而才有大批优秀作家的被发现。他指出:“编辑要是不能发现新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他甚至大声疾呼:“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从这里可以看出,巴金对编辑的职责——发现新作家是多么的重视。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还在于“爱护作家”。他说:“前些时

① 巴金:《关于〈雷雨〉》,《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68页。

候我读过一篇文章,说‘批评也是一种爱护’,我不这样看,不过‘爱护’二字引起我一些想法,我要说,真正爱护作家的是好的编辑。”他明确而肯定地指出编辑要有“爱护作家”的意识。这种“爱护”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编辑好比是一个园丁,发现了成材之树,还要悉心爱护、培养,否则,很有希望的萌芽很可能因得不到爱护、培育而夭折。因此,巴金谆谆嘱咐:“作为编辑工作者,你们应当把自己看作这个园地的园丁,你们做的不仅是介绍、展览的工作,你们还有将‘萌芽’培养成树木的责任。”^①但是,如何来培养呢?巴金认为,编辑对作者的培养应当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生活,要“帮助作者认识生活,扩大他的眼界”;二是思想,要“启发他的心灵,丰富他的修养”;三是艺术,要“使他逐渐掌握艺术技巧,并且了解创作是如何艰苦的劳动”^②。只有这样才是尽到了编辑的培养的责任。不仅仅是编辑者,而且整个编辑部都应当负起帮助和培养作者的责任。其责任是共同的,他说:“刊物的编辑部也应当以细心、周到和热情的态度对待来稿,而且有责任帮助和培养青年作者,把一批一批成熟的作家送进我们的‘文坛’。”^③

第二是珍惜作者“心血”的结晶。巴金在编毕兔午短篇小说集《雨夕》的后记中说:“我不忍心让作者的心血这样腐烂下去。”^④巴金是深知作家创作的艰辛的,每一部作品不知凝结了作家多少的心血,有的甚至是作者生命的创造。因此,编辑爱护作家就要珍惜他们用心血写下的作品。巴金编辑《曹禺戏剧集》,除了对曹禺的作品喜欢,

① 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② 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1页。

③ 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④ 巴金:《〈雨夕〉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对曹禺的为人、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有所了解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觉得由自己担任编辑“不会糟蹋作者的心血”^①。正是出于不让作者的心血腐烂,不糟蹋作者的心血的编辑道义,巴金为许多知名的、不知名的,活着的、死去的作者编辑作品。巴金为罗淑编了4本书,除《生人妻》外,《地上的一角》、《鱼儿坳》和《白甲骑兵》3本都是在罗淑去世后为其编成的,后一本书则是在敌机轰炸、面临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编的。巴金为牺牲的郑定文编书,不仅因为喜欢他的作品,也为作者短暂的一生感到惋惜,巴金在《大姊》短篇小说集后记中说:“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块垒。”^②鲁彦的遗著《鲁彦短篇小说集》,缪崇群的遗著《碑下随笔》都是巴金编成的。田涛的《荒》,则是巴金把作者发表在各个刊物上的作品一篇一篇搜集拢来编成的。巴金说过:“我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又不愿将他的一点心血埋没。”^③他的言与行是一致的,因而他要求编辑要珍惜作者心血的结晶,就既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又有自身的示范作用。

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还在于“团结作家”。他说:“编辑不能团结好的作家,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巴金是从发展文学艺术的大视野看待这个问题的。团结作者首先必须尊重作者,这种尊重表现在编辑对作者的来稿虽有删改权,但是,“有权不必滥用”。巴金认为,编辑“修改别人文章不论大删小改,总得征求作者同意”。巴金以自身的经验告诫编辑们说:“我当编辑的时候,常常对自己说:‘要小心啊,你改别人文章,即使改对了九十八处,你改错了两处,你就是犯了错误。’”但这并不等于编辑被动地看看来稿,然后把它发表出去。编辑仍要发挥能动作用,巴金提出了修改的具体意见,他说:

① 巴金:《〈蜕变〉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8页。

② 巴金:《〈大姊〉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③ 巴金:《〈荒〉后记》,《巴金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

“最好还是笔下留情，一、可以不改的就不改，或者少改；二、一切改动都要同作者商量。”这两条意见其出发点仍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巴金曾说过，他自己的作品被编辑删改了，如果不满意，以后再版的时候，一定还要恢复原样。作者有创作权，也有保留权。编辑的删改权首先必须在尊重作者的这种权力后才能得以使用。编辑只有尊重作者才能团结作者，也才能得到作者的爱护。巴金在做编辑的时候，是很注意团结作家的。他在参加编辑《文学季刊》时，就住在编辑部里。北京三座门大街十四号《文学季刊》编辑部既是他处理日常编辑工作的机关，又成为他团结一批优秀青年作家的地方。当时，李健吾、曹葆华、蹇先艾、卞之琳、何其芳、曹禺、肖乾等人就常到这儿来，与巴金谈文学创作，谈人生道路，也谈论国家大事。巴金成了团结、组织青年作家的中心。巴金在主编《文学丛刊》时也是如此。这套大型丛书（共160本）集中了“五四”时期、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几十个优秀作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就在于巴金团结了一批作家。

最后，巴金认为，编辑的作者意识还在于“编辑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①。巴金认为：“作家不过是一种职业，一个工作岗位。作家不是一种资格，不是一种地位，不是一种官衔。”编辑也同样如此。巴金很不满意于当时的一些“出版官”，他批评说：“这些年同某些出版社打交道，我有一种不应有的感觉，对方好像是衙门。在这方面我有敏感，总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出现了出版官。”^②巴金真诚地希望：“编者和作者站在平等的地位；编辑同作家应当成为密切合作的朋友。”^③

① 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② 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③ 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5页。

编辑离不开作家,“得罪了作家我拿不到稿子”,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表达和概括了巴金的编辑的作者意识。

二、编辑的读者意识

编辑的读者意识与编辑的作者意识同等重要。如果说得罪了作者,编辑就拿不到稿子,那么,得罪了读者会怎样呢?巴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就“不买我编的书,我就无法编下去”^①。因此,在编辑心目中,要时时装着读者,要有一种强烈的读者意识。巴金在一篇题为《把心交给读者》的文章中,谈的是作家的读者意识,但把它当作是谈编辑的读者意识,也同样适用。巴金说:“我的确是把读者的期望当作对我的鞭策。……离开了读者,我能够做什么呢?我怎么知道我做对了或者做错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读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对我们社会的进步有贡献呢?只有读者才有发言权。我自己也必须尊重他们的意见。倘使我的作品对读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读者就会把它们扔进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写作。所以我想说,没有读者,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是把心交给了读者的。”^②巴金对那些向他请教写作秘诀的人回答得也很明白:“把心交给读者。”写作是如此,搞编辑工作也应当如此。

编辑的读者意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编辑应当尊重读者,“把书推荐给读者,请读者作评判员”^③。在巴金看来,编辑只不过是一座“桥梁”,起着中介的作用。读者是通过编辑这个中介而得以阅读到作家的作品的。巴金对有些编辑不相信读者的判断力,不尊重读者是很不满意的。他说:“不要以为读者

① 巴金:《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讲真话的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54页。

② 巴金:《把心交给读者》,《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32、533、534页。

③ 巴金:《探索之三》,《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对当前生活一无所知,对作品毫无欣赏力和判断力。我看,一部作品的最高裁判员还是读者。”巴金甚至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是靠谁保存下来的呢?还不是读者!也只能是读者。”巴金说出个真理,人类全部的文学史、书籍编辑出版史证实了这一真理。有多少书,在出版时被吹得天花乱坠,捧得无以复加,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读者一本一本把它们淘汰了,抛弃了。读者的评判是无情的,但也是最公正的。巴金自己在编辑工作中真正做到了把读者放在第一位,他相信读者的能力,尊重读者的判断,绝不作任何强加。他为许多作者编书,并写了后记,但也只是谈自己阅读的感受。让读者去评判,这是编辑对读者最高的尊重。

二、编辑应当服务读者,“把更多的好作品介绍给读者”^①。巴金自己的编辑工作就是在他的这一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他编辑或主编的刊物《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水星》《烽火》等,以及像《文学丛刊》《译文丛书》等数套大型丛书,都向读者推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有的则成为文学史上不朽之作,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艾芜的《南行记》,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画梦录》等。巴金做编辑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欺骗读者”^②,而是“把心交给读者”,诚心诚意地为读者服务。他主编的《文学丛刊》第1集于1935年11月出版,他亲自撰写了一篇广告附于书后,他自信地说:“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个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就是说里面都是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这种以“好的作品”服务读者的编辑意识,与时下的编辑追求时髦、发表三流四流的作品,甚至根本不入流的粗糙低劣的作品,以欺骗读者的心理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① 巴金:《祝青年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萌芽〉创刊致辞》,《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00页。

② 巴金:《探索之三》,《巴金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549页。

巴金认为，编辑“要是不能经常发表感动读者、吸引读者的好作品，……他们的工作就不会有成绩”。不仅如此，“漏过了好作品是编辑的过失，他会受到读者的批评”。巴金是完全站在读者的角度，从读者的利益出发看待编辑的工作的，他提出的读者批评编辑过失的主张，确是看到了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在接受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对编辑工作的重要影响作用。

有着长期编辑经历的巴金当然也明白，“编辑不可能跟读者对着干，硬要编一本没有人要看的刊物”。这是他站在编辑的立场看问题，表现了他对编辑的理解。从总的趋向看，编辑总希望自己向读者推出高质量的文化精品，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硬要“跟读者对着干”的编辑，是不可能有的。否则，“刊物没有人要看，一定办不下去，编辑也得改行”。在这里，巴金看到了读者对编辑、对刊物的决定性作用。只有有真正服务读者的精神的编辑，才会受到读者的爱护。巴金说：“作为读者，我读到好的作品就想起编辑们的勤劳和苦心，既高兴又感谢。”这说明读者并非是单纯的媒体接受，对编辑的劳绩，读者也是不会忘记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形成双向良性交流，乃是巴金的期望。

三、编辑应当为读者着想，特别是要为“贫寒的读者”着想。这主要是书的定价。巴金为《文学丛刊》第1集出版所写的广告词中说：“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他强调出版这套丛书的一个特色就是“定价低廉”。像曹禺的《雷雨》定价最高只有四角半，张天翼的《团圆》、靳以的《珠落集》、何谷天的《分》、肖军的《羊》都是三角半，至于茅盾的《路》、鲁迅的《故事新编》、沈从文的《八骏图》、鲁彦的《雀鼠集》、艾芜的《南行记》、吴组缃的《饭余集》、郑振铎的《短剑集》、丽尼的《黄昏之献》、李健吾的《以身作则》等十人的集子，则都在三角以下，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定价最低，只售二角。如此低廉的定价，确实是为“贫寒的读者”着想，使他们都